

憶苦思甜

戰後最艱困的新聞工作

● 沈昌煥遺著 · 沈大川恭校

局勢動盪重立據點

今天本人來參加這場盛會，實在非常感動與興奮。看到新聞局今天有這樣的規模，有五十幾個駐外單位；國內有這麼多的處，以及許多能幹的同仁在為新聞局工作奮鬥，我只想很簡單地報告本人在做新聞局長及擔任政府發言人時的情形，大家一定覺得我在講古，簡直是山海經了！

我在大陸做過新聞局長，在翁文灝內閣時新聞局設立，第一任局長是董顯光先生，但不久之後，因政局不安定，政府常常改組。

翁文灝內閣接著是孫哲生先生擔任行政院長，那時還有新聞局，但是董顯光先生無論如何不肯做局長，他到國外去工作。所以輪到我來做新聞局長。在我做局長

後不久，總統蔣介石引退，李宗仁暫代總統職務，遇到這種情形，不久我就辭職了，因為當時變化太大。李宗仁先生不相信政府新聞局長發言人，他派甘介侯先生

做他的對外發言人，所以常常國內、外國記者聽他講的話後回來問我，我沒有辦法證實他的話是對的，我講的話是代表國家的立場，他說他的，我說我的，這怎麼辦呢？後來李宗仁決定接受中共的條件，等於是向中共投降，那時我覺得從我嘴裏講出來絕對不可能，新聞局是政府的一部分，應該接受上級的指示，但是在發生重大政治問題時，局長是政務官，也應該有個人的立場，所以我辭職不幹了，離開南京

到上海，這時正是老總統引退以後不到一個星期。後來到臺灣，我與新聞局沒有關係；新聞局還在南京，後來搬到廣州。政

府遷臺以後，因為政府緊縮，新聞局就取消了。

後來陳辭公說：「政府沒有一個人負責新聞的事情不行，記者要來問，同時也要宣傳政府的政策。那好，你來做政府發言人」（那時大家都不了解什麼是三民主義及三七五減租，而這些都要宣傳），但是法律上沒有發言人這個職位，也沒有預算。

家裏充作辦公地點

這個辦公室沒有辦公地點，就在我家裏辦公，更沒有工作人員，我就是一個人做發言人。我住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十號，就是現在的警察分局的一個日式房子，前面玄關就是我接見記者的地方，就開始辦公了。沒有車子，當時很少汽車，我有一

輛三輪車，大家看了我有三輪車，就像現在用賓士轎車一樣，沒有幾個人有，沒有地方，沒有車子，這怎麼辦呢？

後來，在寶慶路的四層樓房向廖先生租了兩間房子，怎麼辦呢？

總要工作，我一個人也不行，現在到處都有發言人，無論是政府單位，私人機構或公司行號都有發言人。而那時只有一個發言人，幸虧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先生借我兩部吉普車，那時吉普車就好比飛機一樣。

同時配置三個武官，當時有陸軍少將武官張彝鼎、海軍上校武官鄒堅及空軍中校武官虞爲。

那時候發言人辦公室有陸軍、海軍及空軍武官三人協助辦公、吉普車二輛。

那時是發言人室全盛時代，除了他們三人以外另有三個人：

一個秘書、一個會計、一個總務等。

這時臺北沒有幾家報社，我們要鼓勵大家辦報，辦報最困難的是沒有紙張。

二次大戰後缺乏紙張，所以辦報就要配給紙張，幫忙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沒有一家英文報，只有由鄭南渭先生用打字及油印的英文新聞資料，也就

是現在英文中國日報的前身。

他打字後一張一張的油印，沒有錢，我們幫忙他每個月六百美元，可以看到當時我們困難的情形。

對外談不到交通工具，也沒有預算、沒有錢，但是仍然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當時我兼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配合宣傳。

當時叫做公路宣傳、鐵路宣傳。在汽車、卡車上掛起照片及宣傳品，沿路一站一站地做宣傳，利用鐵路工具一站一站的宣傳。

本人和政府有關人員輪流下去到軍中及農村各地去講話及說明政府的政策，我們經過的艱苦情形不能想像。

當時我的薪水每月大約一千二百元臺幣，以後我做外交部長時才一千四百八十元，一般公務員只有幾百元，不到一千元，當時的物價也較便宜，但也不至於低到

何種程度，而現在就不一樣了。各位可以想到當初筆路藍縷辛苦經營的經過。

各位可以想到當初筆路藍縷辛苦經營的經過。

艱困時代莊敬自強

新聞局發展到此種局面，並非我個人

有什麼貢獻，而是我以後的諸位局長，他們的大才、爭取預算、增加人員及擴充設備，所以我深深感到非常感奮也非常慚愧，我們那時是手工業時代，是戰後最艱困的時代。

為什麼當時仍能做很多工作呢？我個人認爲有下列三個因素：

(一) 憂患意識：

上下一心，知道國家所面臨的內憂外患，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許多問題發生，我相信就是因爲缺乏憂患意識。

(二) 節衣縮食：

省吃儉用，現在臺灣很有錢，自然不肯節儉了。

那時候吃大餅油條就滿足了，如能吃到中和鄉的豆漿和燒餅油條就很難得。

(三) 刻苦耐勞：

以精神的力量與戰鬥的意志克服物質困難。

這就是我們當時在沒有錢、沒有人、沒有預算及沒有交通工具等各種缺乏的情況下仍能積極奮鬥的原因。

(全文係沈昌煥資政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日在行政院新聞局舉辦之「邁向五十年」紀念茶會中致詞講稿)

新聞局發展到此種局面，並非我個人